学术专论

国家图书馆藏《察哈尔八旗地图》初步考释

哈斯巴根

[摘要]　国家图书馆所藏《察哈尔八旗地图》一函九幅，较为详细地反映了晚清察哈尔都统辖区的政治地理状况。本文根据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等档案文献，推测该地图集的绘制时间为光绪二年十月至四年四月之间。此外，从牛录边界、官私牧厂、台站卡伦、寺庙鄂博、农耕村落、张家口等地理信息的注记评价该地图集之史料价值。在综合各种文献信息后，考察清廷对长城地带，尤其是对口外地区治理方面的战略地位问题。

[关键词]　国家图书馆　光绪《察哈尔八旗地图》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2－0100－15

在历代有关蒙古地区的地理文献中，晚清张穆所修《蒙古游牧记》最为详实。① 清代官方所修历朝《一统志》《会典》系列文献，基本没有反映察哈尔地区 ② 沿革地理信息，且其人文地理信息也不够全面。此外，《口北三厅志》等地方文献仅记载一个时间节点的察哈尔左翼相关内容。近年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清朝地图集》《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等，均因受资料之限制，其所述地理知识都未能超过 1980 年代出版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部分内容。③

直至目前，虽然学界对察哈尔地区历史地理的探索兴趣不绝，但对新资料的发掘较少，相关资料未成系统，导致不管是清史学界还是蒙古史学界对清代察哈尔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及其沿革说明都不够清晰。另外，在清代蒙古地区的地图中，已经公布若干内外扎萨克各盟旗地图，直接有关游牧察哈尔八旗的专门地图极为少见，国家图书馆所藏《察哈尔八旗地图》显得极其珍贵。本文拟对该地图的内容、绘制时间和史料价值等问题进行初步考释。

[收稿日期]　2023－03－26
[作者简介]　哈斯巴根（1972—　），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hsbgn@126.com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边疆治理视域下北疆多语种舆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3VLS019）\ 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资助项目（20210003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徐维焱：《〈蒙古游牧记〉史源研究》，《西域文史》第 13 辑，科学出版社，2019 年。

② 本文所指察哈尔地区包括察哈尔都统所辖察哈尔八旗、官私牧厂和台站等。

③ 周振鹤主编，傅林祥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本）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侯杨方主编：《清朝地图集》同治至宣统卷，星球地图出版社，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图信息局、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学会编著：《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8 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年。

一、《察哈尔八旗地图》的简介

据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题记：

> 察哈尔八旗图，绘本，未注比例，清光绪年间，9幅，彩色，图廓不等。子目：八旗总图，万全县图，察哈尔正蓝旗、镶白旗、正白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①

该组汉文地图集装在一个函套内，函套上写"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地图》是用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法手绘的地图集。因绘制的内容涉及蒙古游牧地，因此也可以归类为手绘蒙古游牧图。

打开该组地图集的第一幅，除了一幅地图之外另有一张封面纸，上有"察哈尔八旗地图"字样写于长条形红色纸张后，粘贴在纸面居中靠左的位置上。可以判断该地图之原图是折叠装。第一幅地图为长方形，纵横70*125厘米。从其反映的地名看，该幅为察哈尔地区的"总图"。地图方向和现代地图方向是一致的。东、西、南、北4个字都写在红色纸条后，分别粘贴在地图的四边正中位置。图例没有专门说明，但可以看到表示山川、湖泊、森林、寺庙等都有明确的图标。在其地名中，人文地理方面的地名即察哈尔八旗各旗和官私牧厂（即苏鲁克，又称牧群）的周围里数都是用墨色毛笔书写于长方形的红色纸张后粘贴上去的，而剩下的各旗四至八到及自然地名均用墨色毛笔直接书写在纸张上。经统计，第一幅地图上的地名等地理信息共有150多处。

第二幅图，纵横45*45厘米，是在九幅图中唯一没有名称即封面纸张的地图。该图和第一幅图一样标注了方向，和现代地图相同。图例用红色省略号表示交通线路，其他全部地名都是用墨色毛笔书写于红色纸条后粘贴上去的。另外，还有桥梁、山脉、衙门、营房、寺庙等的简单图例。该地图的边缘上有文字，说明察哈尔都统辖区的交界地区和交通路线。此外，地图的右下边缘处有"通桥距大境门七里""大境门距察哈尔两蓝旗俱系七八百里不等"，交待了张家口城里的南北距离和从张家口到察哈尔各旗最远的距离。地图上的自然地理地名大多数是山峰，用国画似的山形图例表示。还有两条河流，即"东沙河""西沙河"。人文地理地名有官方衙门和寺庙等，是用亭子形的图例表示的。标有：绿营教场、同知衙门、管站部员衙门、万全马号、军台印房、都宪衙门、边口税局等。国家图书馆整理的题记命名该图为"万全县图"，似为不妥。虽说张家口是作为万全县的一座城堡、市镇发展而来，但因该图表现的是察哈尔都统驻地张家口城镇面貌，笔者认为命名"张家口图"更恰当。

第三幅图，纵横80*80厘米，其名称清楚地写在封面纸上，即"察哈尔正蓝旗"。我们知道该旗的地理位置在察哈尔八旗的最东端。该图的最大特色是旗下牛录、各官私牧厂等的四至以及边界画得很清楚，以墨色线条表示。牛录、牧厂、卡伦、寺庙、喇嘛徒众游牧地、捕盗旧官兵等主要人文地理地名均写于红色长条形纸张后，粘贴在相应的位置上。四至的信息有："本旗东界扣肯托罗盖""本旗西界珠木尔泰鄂莫""本旗南界霍岳尔奔巴""本旗北界乌兰莽喀"。在地名中，把"多伦诺尔买卖营"也画在该旗的东南部境内。该地图的图例，只有红、墨两种颜色的线条，相对比较单调。红色线表示交通线路。"察哈尔正蓝旗印房"标在"察哈尔第四里登尔什牛录"境内，这是该旗行政中心。从地图看，全部牛录（即蒙古文"苏木"）共有14个，其中有一个分牛录。占据正蓝旗旗地南部的是各种牧厂。其中，驻牧在旗西南面，占地面积最

---

①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文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此地图，国家图书馆索书号为：2194。

大的有“正白旗牛羊群游牧”。这是内务府庆丰司所属上三旗牛羊群之一。其他的一些牧厂是王公等私属性质的，有“景公苏鲁克游牧”“莫尔根①亲王苏鲁克游牧”“额尔克②亲王苏鲁克游牧”“和硕乌尔棍③亲王苏鲁克游牧”“敏贝子苏鲁克游牧”等，都标记在正蓝旗察哈尔境内。此外，该旗中心地区标有“各内牛录闲散等游牧”，东南边界附近标有“内府那苏图牛录游牧”，说明直至晚清仍有部分包衣旗人居住在正蓝旗察哈尔境内。④另外，在“多伦诺尔买卖营”附近还有“会宗⑤、善因二庙”及“喇嘛徒众游牧”。可见察哈尔正蓝旗地上牛录、寺庙、卡伦、牧厂交错相处，状况比较复杂。

第四幅是“察哈尔镶白旗”图，纵横 75.5*80.5 厘米。图例也很简单，和正蓝旗的基本相同，用墨色线条表示边界，红色线条表示交通线路，并以波浪状来表示流过该旗南部的“商都河”。地图把该旗四至交待得很清楚：“本旗东界歹盐”“本旗西界库钭奇栳”“本旗南界河呼哈达”“本旗北界鄂莫⑥”。此外，牛录、牧厂、台站各地之间的边界也标得很清楚。据该图提供的地理信息，察哈尔镶白旗共有 13 个牛录，其中有 2 个半分牛录，在察哈尔八旗各旗中牛录数量最少。另有，在该旗土地上有“驻多伦诺尔庙喇嘛徒众”和独石口驿道之“独石口头站”。但是，没有注明旗印房所在地。官属性质的牧厂有内务府所属正白旗羊群和太仆寺所属右翼牧群。私属性质的牧厂有“法封阿⑦亲王苏鲁克”“恒贝勒苏鲁克”“凌公苏鲁克”“玉公苏鲁克”“永公苏鲁克”等，其中永公和法封阿亲王牧群都各有两处。另有私属性质的是“阿家胡图克图苏鲁克”。阿家即阿嘉，是驻京呼图克图之一。⑧

第五幅图名为“察哈尔正白旗”，纵横 110.5*85.5 厘米。和其他图相比，该图颜色除了红、墨之外，增加了蓝色。墨色线条表示边界，红色线条表示交通路线，蓝色表示山峰、河流、湖泊及沙地和山峰植被少的裸露之处。流过该旗北部地区的“布尔噶台河”即用较粗的蓝色线条来表现。图中的人文地理信息均写在红色纸条上粘贴上去，而山峰、湖泊、河流等自然地理地名是用墨色笔直接书写在纸张上。还有寺庙的名称也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纸张上的。这一点和其他地图有所不同。在该图的正中位置画有该旗行政中心：“本旗印房、满洲理刑官衙门、寿安寺，宽二十里，长二十里，”北靠额尔德尼察汗鄂卜图山。山上还有祭祀的鄂博，印房附近用四方形表示“牢狱”。该旗的四至八到，正东界（原文有明显错误，写成“正南界”）“胡什业奇鲁，毗连察哈尔镶白旗西界，至东南穗子岭三百二十里，至本旗印房六十里”；“正西界哈普达凯阿林，⑨毗连察哈尔镶黄旗东界，至西北诺管诺鲁博罗托里木七十里，至本旗东界胡什业奇伦八十里”；“正南界张麻子井，毗连独石厅属西北界，至西南布丹图山三十五里，本旗北界至喀拉诺尔三百七十里”；“正北界喀拉诺尔，毗连左翼素尼特南界，至东北哈拉图哈珠布拉克三十里，至本旗印房一百一十里”。该旗图是各旗图中把外部边界信息交待得最为清楚的一幅图。正白旗和外地联系的交通线路，用红色线条表现，长的有六条线路。正白旗所属牛录的数目比较多，达到 18 个，其数量排在察哈尔八旗之第三位。但是，依然没有明确指出整牛录和半个牛录之区

---

① mergen，满语，“莫尔根亲王”即“睿亲王”。参见哈斯巴根：《清代口外王公牧厂探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② erke，满语，“额尔克亲王”即“豫亲王”。

③ urgun，满语，“和硕乌尔棍亲王”即“和硕怡亲王”。

④ 哈斯巴根：《清代蒙古八旗口外游牧地考》，《清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祁美琴：《清代包衣旗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 年。

⑤ 误，应为汇宗寺。

⑥ omo，满语，意为“湖泊”。

⑦ fafungga，满语，“法封阿亲王”即“肃亲王”。

⑧ 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三章“驻京各呼图克图”，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 年，第 142–148 页。

⑨ alin，满语，意为“山”。

别。牛录的四至和长宽里数都有交待。据地图，该旗地上共有 15 座藏传佛教寺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旗印房附近的寿安寺，以及太仆寺属喇嘛玛拉噶庙、永福寺、马王庙等。在该旗境内牧厂中，占地最大的是靠旗境西南部的“左翼太仆寺牧群游牧，至本旗印房二百余里”。左翼太仆寺牧厂的东边有“李亲王[①]牧群游牧，周围六十四里”；“本旗管辖公德格音属奴仆人等居住”，“德公牧群游牧，周围二百四十里，此处作为开垦田地，已归独石厅管辖”。德公牧厂的东北面有“任任总管等牧群游牧，至本旗印房一百余里。”该旗图另有两处古城遗迹，即“尺伦巴勒噶素”和“博罗城子”。

第六幅图名为“察哈尔正黄旗”，纵横 75.7*75.5 厘米。据该图载：“自本察哈尔正黄旗游牧东至西宽四十余里，自南至北长三百余里，周围七百余里。”图例仍为红、墨两种线条，分别代表边界线和交通路线。四至信息有：“本旗东界哈杨奇鲁瓦”“本旗西界孤树”“本旗北界巴伦札拉”。在该旗南部正中位置粘贴“本旗南界”，但没有具体地名。用红色线表示两条交通线路。该图没有体现作为该旗行政中心的印房。旗所属牛录的总数达到 19 个，在察哈尔八旗中最多。在旗的东部地区有几个牧厂，占据很大的土地面积。这些牧厂有“商都达普孙诺尔驼马群”“正黄旗羊群”“正黄旗牛群”“右翼太仆寺牧群”等。其中，右翼太仆寺牧厂处在该旗的东南边界以内，在其西北面有贝勒洪印吉苏鲁克。旗的西南边界附近还有公鲁先苏鲁克。另外，在旗中心地区有“大同府官牧厂”，属于大同驻防绿营兵马厂。[②]以上牛录和牧厂都有四至信息。

第七幅图名为“察哈尔正红旗”，纵横 112*67 厘米。图例比较丰富，既有表示边界和交通线路的墨、红色线条，又有表示山峰的山形图示，还有以亭式图例表示寺庙，用墨色波浪状表示河流。除了四至八到信息之外，其他地名都先写在红色长，然方形纸条上后粘贴在纸张的相应位置。该旗行政中心“正红印房”，用类似寺庙的图例表示，比较显眼。据图，该旗共有 14 个牛录，但仍未注明整牛录、半个牛录之别。靠该旗西南边有“详公新招牧群地亩”，表示王公牧厂的开垦情况。该图另画有 5 座寺庙。地图所绘山峰相当多，但均未注名。河流有“和罗图河”和其支流“那尔逊河”。另外，在湘公牧厂境内有“吴家窑子河”。

第八幅名为“察哈尔镶红旗”图，纵横 128*73 厘米。其图例中较特殊的是用蒙古包的形状表示牛录、牧厂的所在地，以及分别处在旗南北段的“代翰诺尔”[③]和“宁远厅属塔拉库布尔旧地亩”。后者虽没有注明其长宽，但从图画看面积和代翰湖差不多大小。另外，山峰的图例，用蓝色、紫色加墨色线条表示。该旗四至：“本旗东界朔伦，毗连正红旗地界”，“本旗西界哈拉乌苏，毗连镶蓝旗地界”，而南界和北界只是写“本旗南界”和“本旗北界”字样，没有记述具体的地名，“北界”旁边写有“毗连四子扎萨克地界”字样，在“南界”的两边东南界、西南界都和“宁远厅属旧地亩”接壤。交通路线比较多，和其他旗的地图不同，用紫色线条表现的。布里彦河边上有“本旗印房”。“西勒哈达”附近还有“本旗庙”和“本旗鄂博”。该旗共有 14 个牛录，而各牛录都没有注明其四至、周围里数和边界线，也没有注明整、半牛录之别。在牧厂中，“托普（庄）亲王牧群”在旗的靠北边的地区，处在塔拉库布尔旧地亩以北，也是用蒙古包的图示来表示的。另外，有诺莫坎[④]郡王牧群和“捕盗官兵牧群”。寺庙有“章加呼托克托玛尼图庙”“本巴庙”等。古城遗迹有“巴勒噶苏”和“喀勒巴勒噶苏”。

第九幅为“察哈尔镶蓝旗”图，纵横 82*78 厘米。色彩很丰富，可以看出镶蓝旗的山峰和河流比较多。该图的地名除了四至八到的信息之外，均书写在红色方形纸张后粘贴在相应位置上。该图虽然没有牛录一级的边界线，但在察哈尔各旗图中是将该旗外界之四至八到表现得

---

① 误，应为“礼亲王”。

② 《贻穀附奏开放大同厂地所收押荒由该厅解交司库片》,《垦务奏议》，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235-236 页。

③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49《察哈尔》载：黛哈池，又名奄遏下水海，在镶红旗南四十里。

④ nomhon，满语，“诺莫坎郡王”即“良郡王”。

最清楚的地图之一。另外，与外界的交通线路有“通达绥远城大路”“张家口通达多伦诺尔大路”“通达丰镇厅路”等。“该旗公所衙门”处在旗的中部地区一条河边上。寺庙不多，基本都处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游牧区域，有玛尼图庙、固善奇额勒恒额庙、巴塔克庙等。西南部牧厂附近还有托诺依庙。另有处在旗东南边界附近的巴彦察罕鄂博。西部地区比较显眼的一个图例是表示农耕区村庄的华北地区农村的民房建筑式样。这说明镶蓝旗的西部地区的农耕化在整个察哈尔八旗中最为普遍。据图，镶蓝旗共有 14 个牛录，但依然未反映整、半牛录之别。该旗有不少牧厂，但从地图可以看出来其大部分土地已经成为农垦区。如西南部有“长详牧群地亩”“恒禄地亩”“松公地亩”等。此外，有“格们额[①]亲王牧群游牧”“长禄牧群游牧”等两个牧群强调其“游牧”，可以推测其土地上有部分游牧经济的存在。旗东南边界附近标有“达罕诺尔”，即有名的黛哈池。但是，该湖处在镶红和镶蓝二旗接壤地区。地图的东北边界附近有“郭岳会达布苏”，即盐湖。其南用淡绿色表示八个小湖，湖名为“叶楞依苏诺尔”。蒙古文意为九十九个湖，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其正式的名称为“九十九泉”[②]。

二、《察哈尔八旗地图》绘制年代的推测

清代是蒙古地区地理知识突飞猛进式发展时期。从康熙《一统志》《皇舆全览图》开始注意记述蒙古地区的地理信息。但存在的问题是，察哈尔都统辖区内的察哈尔地区政治地理情况少有专门地图及图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绘制的《口外诸王图》是目前发现的清代最早的蒙古地区舆图之一。[③]地图所记地名以“牧厂”之名表示了察哈尔八旗各旗的游牧地，也表现了简单的旗边界，以及各旗牧厂与张家口、独石口等长城各口的距离里数。[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开始有“察哈尔”专图，注明察哈尔八旗各旗四至八到、御马厂、礼部牧厂、太仆寺左右翼牧厂、山川等地名，[⑤]但王公牧厂及察哈尔各旗内部边界等信息均无注记。光绪《大清会典图》虽有“察哈尔图”一、二、三分图，[⑥]但其信息也基本没有超过《嘉庆重修一统志》。乾隆初期所修《口北三厅志》，[⑦]亦无绘制各旗边界、旗下牛录和王公牧厂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卷，也主要受体例和资料限制，没有注记察哈尔八旗和附近各牧厂内部边界等信息。

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文献，清代蒙古地区从乾隆年间开始就有盟旗边界地图及相关档案。[⑧]察哈尔镶白旗在乾隆七年（1742）已有“所定地界册档”。[⑨]康熙十九年（1680），察哈尔正黄旗佐领巴达玛之曾祖台吉逊第因军功奉旨赏给游牧地方，有三百余里，中隔海拉坎山。乾隆四十九年，当地官员会同“将山前私垦地亩立定界址公同勘丈明确，造册绘图，由升任布政使景禄复核详送前来”，将其图册咨送户部查核。[⑩]此外，正黄旗又兼辖贝勒弘明马厂，于道光二十一年

① kemungge，满语，“格们额亲王”即“简亲王”。

②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49《察哈尔》，《四部丛刊》本。

③ 哈斯巴根、成崇德：《关于〈口外诸王图〉》，《清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④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4 页。

⑥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 145。

⑦《口北三厅全图》，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1《地舆》，《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1968 年。

⑧ 相关研究参见田清波：《关于鄂尔多斯蒙古七旗地图》，内蒙古伊克昭盟档案馆编：《鄂尔多斯研究文集》第 2 辑。

⑨《察哈尔左翼局详请印启等禀呈祖遗牧厂一案业经查明应否销案候示遵行由》，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1999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 1704–1705 页。

⑩《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刘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馆藏（本文未注明的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号：04-01-22-0038-037。

（1841）也绘制地图呈报清廷。①

清代蒙古地区地图绘制一般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一是清廷准备编纂新的《一统志》《会典》系列官方文献，需要蒙旗方面的地理信息。察哈尔旗群各界址曾于光绪二十四年绘图咨送过会典馆。② 二是边界纠纷需要绘制相关地图。边界纠纷又分为内、外两种形势，即蒙旗内部下一级行政区域（牛录和官私牧厂等）边界划分的需要，或因开垦引发的外界（与其接壤的其他蒙旗或厅县等）边界划分的必要。另外，王公等将其所属牧厂上交朝廷时也会附上其地图。

据国家图书馆目录推测《察哈尔八旗地图》的绘制年代为光绪年间，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段。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档案资料，证明其具体绘制年代。然而，《察哈尔八旗地图》很突出的文献价值之一是基本交待清楚了每旗所属每个牛录之长即佐领的姓名。虽然有同名佐领的出现等问题，但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以下笔者首先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从佐领姓名入手逐步靠近地图绘制的年代。其中，当然佐领的上任和休致时间是关键信息。

我们首先关注察哈尔正蓝旗，其内一佐领名为吹苏隆札普。光绪十六年十二月，正蓝旗参领贡都散保升任察哈尔正黄旗总管，遗出参领之缺。因查有光绪十三年十一月补放参领拟陪时，奉旨记名公中佐领吹苏隆札普一员，循例上报坐补参领。③ 然而，不幸的是吹苏隆札普于光绪二十八年六、七月间因拭枪失手导致自伤身亡。当时他应该是升任参领已经过十二年了。④ 他身亡报道上没有注明兼职佐领，说明他升任参领之后就不再兼职佐领了。据《察哈尔八旗地图》之正蓝旗图，吹苏隆札普是额鲁特牛录之长，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察哈尔八旗地图》是吹苏隆札普升任参领之光绪十六年之前所绘。

此外，幸运的是当时任察哈尔都统的额勒和布日记流传至今。据其记载，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初七日，“正蓝旗旧鄂勒特即额鲁特公中佐领一缺。拟正：图们；拟陪：吹苏隆札普”。⑤ 按制度来讲，佐领出缺后第二次选补时吹苏隆札普才有机会拟正上任佐领。因此，他任佐领的时间大致可以推断为光绪元年以后的事情。另有记载，同治十二年八月，察哈尔镶蓝旗佐领一缺，拟正：三音济尔嘎勒。⑥ 查看《察哈尔八旗地图》镶蓝旗图，出现同名的两个佐领，分别是第八察哈尔佐领和第十三新额鲁特佐领。不管哪一个佐领，应该均为同治十二年八月以后上任的。这可以作前面推测的佐证。我们进一步推测，《察哈尔八旗地图》是同治十二年八月以后绘制的。另有一份证据是，同治十三年七月，察哈尔镶蓝旗公中佐领图普德恩因病请原品休致，时年六十三岁。⑦ 地图没有出现此人姓名，则可推断我们下一步要考察的地图绘制时间段大致是光绪元年至十六年。

档案反映，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察哈尔镶白旗参领兼公中佐领阿玉巴扎尔请原品休致，时年六十五岁。⑧ 据地图，他是巴尔虎第九牛录之长。当年十月，正白旗旧额鲁特公中佐领罗勒嘎尔原品乞休，时年七十一岁。⑨ 他是旧额鲁特第十一牛录之长。光绪十一年五月，镶白旗公中佐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呈贝勒弘明马厂地图》，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档案号：03-3391-126。

② 《贻谷批左翼局详太仆寺牧地、德公马厂应否一律勘丈，仰由局派员挨次丈量（附详）》，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 1860-1861 页。

③ 《宫中档朱批奏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奎斌奏，档案号：04-01-16-0231-137。

④ 《宫中档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奎顺奏，档案号：04-01-16-0273-006。

⑤ 额勒和布:《额勒和布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328 页。

⑥ 额勒和布:《额勒和布日记》下，第 365 页。

⑦ 《宫中档朱批奏折》，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庆春奏，档案号：04-01-16-0200-087。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托伦布奏，档案号：03-5215-100。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托伦布奏，档案号：03-5844-015。

领巴札尔什迪年老乞休，时年七十岁。[①] 他是察哈尔第四牛录之长。光绪十年十二月，镶白旗佐领拉特那巴札尔因病乞休，时年五十岁。[②] 他是察哈尔第十一个半之署佐领。光绪七年，察哈尔正红旗公中佐领绰克图莽鼐因病乞休，时年六十五岁。[③] 他是额鲁特第十一牛录之长。以上佐领姓名均出现在相应的各分图上，所以说地图肯定是在他们任职重叠时间内绘制而成的。此外，光绪六年十一月，察哈尔正红旗佐领鲁普桑栋鲁普乞休，时年六十五岁，[④] 但他姓名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因此，推定鲁普桑栋鲁普任期时间和地图绘制时间不可能重叠。

继续缩小考查范围。再据光绪元年档案，出现察哈尔正黄旗佐领吉里克札穆苏、镶蓝旗佐领郭兴阿。[⑤] 当年，正蓝旗公中佐领布彦[⑥] 和镶蓝旗巴尔虎公中佐领达那什勒等均因病乞休。[⑦] 光绪二年，正黄旗世管佐领图蒙鄂勒哲依三岁，需要派署理佐领图记之员。[⑧] 当年二月，还有镶白旗公中佐领巴勒丹札穆散也因病乞休。[⑨] 以上多名佐领姓名，均未出现在各该旗分图上。但需要说明的是，正黄旗图没有注明第十一、十二佐领姓名，笔者推测在此提到的图蒙鄂勒哲依应该是这二佐领之一。可能因他当时年仅三岁，有人代他署理图记，所以没有注明其姓名。光绪二年十月，新承袭正红旗佐领孟克济尔嘎勒六岁，因未及岁，准备派一名署理佐领图记之员。[⑩] 正红旗图记述孟克济尔嘎勒为察哈尔第一牛录之长。由此，可以否定光绪二年十月前绘制的可能性。

另据一件档案记述，光绪五年二月，察哈尔镶蓝旗公中佐领噶勒桑因病乞休，时年六十二岁。[⑪] 我们知道镶蓝旗图的佐领姓名是齐全的。但是，并未出现该佐领姓名。这样的话地图绘制时间的推测也需要相应提前。光绪四年四月，又提到察哈尔正黄旗世管佐领图蒙鄂勒哲依和镶红旗佐领英山（留京当差），都需要替换署理之员。其中，曾兼署理之二位是由护军校升任佐领之贡果尔札普和由护军校升任佐领之额林臣。[⑫]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图蒙鄂勒哲依前面已经提到过，光绪二年时他已经是佐领了。英山的任职时间应该也比光绪四年四月要提前。此外，正红旗图和镶红旗图均无贡果尔札普和额林臣二佐领之姓名。而镶红旗图有名佐领叫音山，应该是“英山”的蒙古语音译之另一种写法。因此进一步判断，《察哈尔八旗地图》的绘制时间可以圈定在光绪二年十月至光绪四年四月之间。也就是说，察哈尔都统衙门的工作人员根据光绪三年前后察哈尔各旗地理信息最终绘制成《察哈尔八旗地图》。

再考察地图绘制时代的察哈尔政局，当时察哈尔八旗出兵参与西北回民起义的镇压之后，处在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时期。从光绪二年十月至三年八月不到一年之间三换都统，最后原青州副都统穆图善升任察哈尔都统。[⑬] 因此，也没有观察到什么特殊原因，与大规模绘制地图有关。但是，大致可以判断《察哈尔八旗地图》的绘制的历史背景及功能问题，应该和当地晚清时期农耕的推进等导致各旗内外边界需要澄清有很大关系。

在清末官垦期间，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穀也一直非常重视地图绘制工作。当时贻穀就认识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绍祺奏，档案号：03-5833-027。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八日绍祺奏，档案号：03-5830-027。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祥亨奏，档案号：03-5815-115。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祥亨奏，档案号：03-5812-060。

⑤ 《宫中档朱批奏折》，《奏为拣选索特诺玛请补察哈尔正黄旗骁骑校事》，光绪元年，档案号：04-01-17-0119-012。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七月十六日庆春奏，档案号：03-5099-062。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八月十九日庆春奏，档案号：03-5770-068。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庆春等奏，档案号：03-5776-090。

⑨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统庆春等奏，档案号：03-5774-089。

⑩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统庆春等奏，档案号：03-5780-008。

⑪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穆图善等奏，档案号：03-5799-083。

⑫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四年四月初五日穆图善等奏，档案号：03-5793-087。

⑬ 《清德宗实录》卷 55，光绪三年八月庚寅。

到察哈尔地区政治地理之复杂性，非常重视收集相关地图资料，并下令要求察哈尔各旗将“旧存图册”汇齐送到其行辕。① 他亲自前往张家口，和察哈尔都统等商定推行察哈尔左右翼垦务的步骤，再次强调“分绘详图”之必要性。② 可以了解到，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贻榖赴张家口至当年年底，随着垦务工作的布置进行，垦务局的陆续设立，察哈尔各旗和附近牧厂之边界划分、地图绘制工作也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贻榖在任垦务大臣期间形成了各类地图。光绪二十九年初的消息也为这一推测提供旁证。据察哈尔左翼垦务局报道镶黄旗情况：“查各旗图册，王公马厂皆隶在四旗，其三群境内并无王公牧厂。”③

近年，笔者又见到一组相关地图集。1942 年，由“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内政部地政科”整理出版《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④ 该书公布了在清末贻榖主政官垦时期形成的档案文献中有关原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等所属各旗、牧厂之多幅地图。其中，察哈尔都统所属各旗和牧厂之地图有《察哈尔左翼四旗张独多三厅地图》《察哈尔右翼四旗总图》《察哈尔正黄旗地图》《察哈尔正红旗地图》《察哈尔镶红旗地图》《察哈尔镶蓝旗地图》《德公牧厂地图》各一张，均为墨色手绘地图。⑤ 在这些地图中，察哈尔右翼四旗地图与国家图书馆藏《察哈尔八旗地图》中相关四旗地图无论是绘制技法、构图框架及所记地名、佐领姓名等基本一致。剩下的《察哈尔左翼四旗张独多三厅地图》《察哈尔右翼四旗总图》合起来就等同于《察哈尔八旗地图》之第一幅总图。笔者比较两种地图后认为,《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所公布的地图与国家图书馆藏《察哈尔八旗地图》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不同：第一，在反映的地理信息方面，两图地名不尽相同，前图有更多的耕地信息。第二，后图地名全是汉文的，但是前图中的正红旗图、镶红旗图的地名是汉满合璧的。笔者认为，两图虽均为晚清察哈尔地区的地图集，但总体上前图比后图更为成熟，其绘制的时间应该是贻榖主政官垦时期。其证据有二,一是地图上出现“光绪十年”字样，二是察哈尔左右翼的分界线已经清楚划定。我们知道该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八年下半年。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虽然贻榖之前察哈尔都统已经把《察哈尔八旗地图》等地图送达清廷相关中央部门，但是，其中有一些地图资料一直到贻榖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垦务局等机构人员以《察哈尔八旗地图》相关地图为基础，完善和绘制了不少察哈尔各旗佐、牧厂等地图，⑥ 民国时期由“伪蒙疆”政府方面公开出版。

此外,《察哈尔八旗地图》这一函地图集并非没有瑕疵。我们看到有些地名或者地名的汉文音写方式与当时比较准确的写法有差别，另外有一些错别字或不同的音译法。如把“礼亲王”错写为“李亲王”,“章嘉胡图克图”写成“章加胡土克托”,“额鲁特”写成“鄂勒特”,“浩齐特”写成“霍奇特”，等等。此外，个别旗图似乎是尚未绘制完毕，如右翼镶红旗图与《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之镶红旗图相比，发现其地名很多地方均为空缺，可见其绘制之匆忙。

此外,《察哈尔八旗地图》保存到国家图书馆的时间，应该是 1958 年察哈尔地区并入锡林郭勒盟之后的事情。首因在地图集函套外写有“锡林郭勒盟”字样。另一方面笔者所查民国年间北平图书馆相关文献目录中均未发现《察哈尔八旗地图》之编目信息。

---

① 《贻谷咨取各旗地图由》，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 1791 页。

② 《宫中档朱批奏折》,《奏为筹议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务办法情形事》，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档案号：04-01-22-0066-144。

③ 《贻谷咨明察哈尔都统、副都统将私买私卖牧地总管博特王尔济等分别摘顶记过由》，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 1691-1692 页。

④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民族文化研究会编：《绥远地区垦务档案选编》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1942 年，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

⑤ 《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1942 年。

⑥ 内蒙古档案馆藏《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行辕》全宗档案目录。

三、《察哈尔八旗地图》的史料价值

《察哈尔八旗地图》的文献史料价值，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察哈尔八旗地图》明确绘出察哈尔八旗大部分旗的行政中心和所属牛录的地理位置以及各牛录的边界。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8 册（清时期，以下简称“谭图”）没有画清楚察哈尔八旗各旗的边界，更没有苏木和各牧厂的边界。最近出版的《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和《清朝地图集》察哈尔地区的地图无论从地名的详细度和边界表现方面亦均未超过谭图。《察哈尔八旗地图》除了没有镶黄旗图，镶白旗、正黄旗两个旗没有记其行政中心之外，其余的五个旗都注明了其行政中心“印房”。但是，该地图所表现的印房所在地，与《口北三厅志》有出入。正蓝旗印房画在第四牛录境内，而正白旗“本旗印房、满洲理刑官衙门、寿安寺，宽二十里，长二十里”，表明旗印房还占有一定面积的直属土地。再如，镶蓝旗印房，《口北三厅志》附图记在大海即岱哈湖以西查汗哈达以南，而《察哈尔八旗地图》之镶蓝旗图画在沙拉哈达以南，离查汗哈达有一定的距离。从中可以了解到各旗中心位置之历史沿革。

察哈尔八旗各旗牛录数目，雍正十年（1732）增编前，察哈尔左翼有 46 个牛录，右翼有 35 个牛录，总计 81 个牛录。据档案，当年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建议将察哈尔、巴尔虎繁衍兵丁、王公牧厂人、归附者等 2000 余名男丁，组编 19 个牛录，和原有 81 个牛录，合计 100 个牛录。此 100 个牛录，每翼各 50 个，每旗各十二三牛录。① 据《实录》，该项建议得到皇帝的允准。② 其后，乾隆中期平定准部后从口外察哈尔派遣兵丁 2000 名西迁新疆。但据嘉庆《大清会典》，乾隆后期察哈尔八旗仍然有 120 个牛录。另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察哈尔八旗共有 120 个牛录，③ 也说明了历朝编入察哈尔八旗的异姓佐领情况。但是，《清朝续文献通考》载察哈尔八旗有 109 个牛录。④ 以上所述清官方之记述互不相同。《察哈尔八旗地图》所记，和前面记载有一定出入。据《察哈尔八旗地图》，正蓝旗有 13 个整牛录及 1 个半牛录，镶白旗有 11 个整牛录及 2 个半牛录，正白旗有 18 个牛录，正黄旗有 19 个牛录，正红旗有 14 个牛录，镶红旗有 14 个牛录，镶蓝旗有 14 个牛录，正白、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5 个旗都未区分整、半牛录之别。地图反映的 7 旗合计 103 个整牛录和 3 个半牛录，再加上镶黄旗 17 个整牛录和 2 个半牛录，共有 120 个整牛录和 5 个半牛录，和上述 120 或 109 个牛录有一定的出入。从中了解到直至清末察哈尔八旗各旗牛录数目并不整齐。⑤

第二，画出晚清官私牧厂的地理位置和边界。

清初以来，在口北察哈尔及其附近地区设置多处官私牧厂。⑥ 上驷院所属御马厂即大马群的地理位置，各种文献记述存在疑点。《口北三厅志》误认为御马厂就是太仆寺牧厂。⑦ 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御马厂即大马群是内务府上驷院所属牧厂。学界普遍认为，上驷院所属察哈尔地区牧厂有两处，即上都牧厂和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上都牧厂处在上都河流域。⑧ 但是，《察哈尔八旗地图》没有注明上都河流域有什么御马厂即大马群。而据清末垦务档案，大马群“与

---

①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雍正十年六月初八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档案号：0029-779-0002。

② 《清世宗实录》卷 120，雍正十年六月癸亥。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977《理藩院》。

④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27《舆地考》。

⑤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雍正十年五月二十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档案号：0095-779-0001。

⑥ 哈斯巴根：《清代口外王公牧厂探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⑦ 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6《台站》，第 103 页。

⑧ 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18 页。

正黄牛羊群、镶黄牛群、镶黄旗、那王马厂毗连”。[①] 处在张家口以北，而不在独石口东北一百四十五里处。以往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清中期大规模开垦后各牧厂北迁的具体过程。礼部牧厂、上都牧厂的消失可能都与此有关。从清前期的记载和《察哈尔八旗地图》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一些历史沿革情况。所以说“商都”地名是从“上都”来的。[②] 但晚清时仍然说上驷院所属有上都牧厂和达布逊诺尔牧厂两个牧厂，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晚清时大马群就是商都达布逊诺尔驼马群牧厂。也就是说，清中期上都牧厂从原来的独石口外往北迁徙后合并成为“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此外，据《察哈尔八旗地图》独石口外各旗地图，在正蓝图上记有“正白牛羊群游牧”，镶白旗图有“正白旗羊群游牧”和“右翼太仆寺牧群游牧”，就是说正白旗牛羊群在察哈尔正蓝旗与镶白旗二旗之间游牧，但牛群和羊群还是有地域分界的。[③] 正白旗图没有注明官属性质的牧厂。以往一般认为内务府庆丰司所属察哈尔地区的牧厂有五处，而正白旗牛羊群是其一。[④]

第三，明确画出察哈尔境内台站、卡伦的地理位置。

现阶段的研究只是利用《清实录》《理藩院则例》等官方文献探讨过内外蒙古地区五路驿站的设置、路线和管理。[⑤] 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充分挖掘相关档案，对阿尔泰军台的研究极为薄弱。《口北三厅志》注明阿尔泰军台从第一台察汉托落海至终点第二十九台胡克深鄂尔坤到阿尔泰新城，共有正站 29，腰站 15 个，合计 44 台。其中，第一台察汉托落海即察罕托罗盖。布鲁图是第八台鄂峦胡都克和第九台西拉木楞之间的腰站。第十一台是赛尔乌苏。第十六台木胡尔嗐淳，即穆霍尔嘎顺。[⑥] 但是，地图所记“军台第四段窄尔玛克泰”，在此没有提到。同治年间，发生西北回民起义，内外蒙古西部地区受到冲击，一段时间阿尔泰军台外蒙古段遭到破坏。同治十年十二月，按照要求由官员等将“军台 44 站舆图”呈交上来。[⑦] 该阿尔泰军台地图集共有 22 幅图，每幅画有两个台站地，清楚地注明每站的四至及每台向归何盟何旗。头台察罕托罗海，第二台布尔嘎苏台，第十三台布鲁图，第二十四台默霍尔嘎顺，但仍未注记“窄尔玛克泰”“赛尔乌苏”两个台站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末蒙古部落分布图》也清楚地注明阿尔泰军台等蒙古地区驿站交通线路，[⑧] 察罕托罗盖、布鲁图、穆霍尔嘎顺（莫和尔噶顺台）、赛尔乌苏（赛尔乌素台）等台站之名均记录在图，但仍然没有“窄尔玛克泰”。韩儒林曾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蒙古驿站的考订工作。他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大清会典事例》《一统志》等资料，对内蒙古五路驿站和阿尔泰军台的方位等进行考释。[⑨] 金峰也是较早注意研究清代蒙古地区驿站交通及其管理制度的学者。他分析，从同治十年开始阿尔泰军台分段管理，又作表指出察罕托罗盖所属有 12 台，布鲁图所属 11 台，默霍尔嘎顺所属 11 台，窄尔玛克台所属 10 台等。[⑩] 金峰称其研究的根据之一是满文《站名》，但没有注明该资料的收藏单位，所以笔者无法进行核对。幸运的是，同治十年十二月，由察哈尔都统额勒和布“奏报遵旨整饬台站办理

---

①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 1710 页。

② 忒莫勒：《“商都”地名考》，《内蒙古蒙古语地名文化研究（汉文版）》2015 年第 1 期。

③ 《正白羊群牧地地图》，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2283。

④ 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第 219–220 页。

⑤ 金峰：《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1 期；金峰：《清代蒙古台站的管理机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1979 年；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第二、三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⑥ 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6《台站》。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呈军台四十四站舆图》，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4984–081。

⑧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第 143 页。

⑨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4 页。

⑩ 金峰：《清代蒙古台站的管理机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1979 年。

情形事”档案保留至今。[1] 据该都统所报，察汗托罗盖、布鲁图所属有 23 台，默霍尔噶顺、窄尔玛克台所属有 21 台。再次出现“窄尔玛克”，可见同治年间依然使用此台站名，也明白“窄尔玛克泰”的“泰”是台站之“台”的音译异写。额勒和布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任察哈尔都统。期间，他主持整顿阿尔泰军台工作。同治十三年正月，他亲自巡查阿尔泰军台各站。据他日记载，阿尔泰军台第三十五台希保台，即“斋拉玛克台”。[2] 斋拉玛克台即窄尔玛克台，蒙古文 jairma γ, 意为“初结的薄冰”。我们对比清末的台站名与《口北三厅志》可以发现阿尔泰军台的交通路线从乾隆朝到清末其最后一段路线的改变情况。

再看镶白旗图所记“独石口头站”，注明其四至。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奎屯布拉克站在察哈尔境内,[3] 但未载明处于哪旗境内，或毗连何旗。《口北三厅志》[4] 所说“独石口军台”可能有误，应该是普通的驿站，并非属于军台性质。独石口驿站，汉驿一，蒙古驿六，独石口驿站部员管理。道光《理藩院则例》清楚地交代了 50 名达夫即驿丁之来源。[5]

除了台站之外，在《察哈尔八旗地图》各旗图上清楚地看到各牛录或牧厂境内的卡伦。清代卡伦，根据其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内地卡伦和边境卡伦。宝音朝克图主要利用《朔方备乘》等文献探索边境卡伦之沿革。[6] 然而包括漠南地区卡伦在内的内地卡伦研究较为薄弱，在这方面，本组地图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第四，地图绘画了察哈尔八旗各旗寺庙、鄂博等，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察哈尔地区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生活。

清代是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繁荣发展的时期，察哈尔地区也不例外。但是，清代的文献，包括高僧们的传记等很少提及这一地区寺庙的情况。[7]《会典》《一统志》官方文献等也很少记录当地的寺庙、鄂博等人文地理信息。因此目前我们对清代察哈尔地区的寺庙知之甚少。《察哈尔八旗地图》之正黄、镶白二旗等图没有注记寺庙，已经注明的其他五旗的四十几座寺庙已经表现出晚清察哈尔地区藏传佛教的盛行状况。此外，其中有些寺庙明确注记是旗寺庙或牧厂寺庙等，还有一些寺庙可能是牛录寺庙，这是蒙古地区宗教信仰的一大特点。

第一幅图正中位置附近画有“哈杨奇鲁瓦庙”，也是这幅图唯一一座寺庙，可见该寺地位之重要性。《口北三厅志》附图在上驷院马驼牧厂紧挨着记“海音汽力瓦庙”，即哈杨奇鲁瓦庙。[8]《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之“正黄旗地图”在商都达布逊诺尔驼马群境内记有“哈杨奇鲁瓦庙”。此外，笔者收藏一部蒙古文文献，封面上用口语化的形式写着蒙古文题名：geü yi üres nü sudur（母马之驹祭洒经），似为晚清或民初的手抄本。经文是为马群的繁衍而祈祷的祷告之文。其中就出现“morin terigütü qayangqirw−a”字样。morin terigütü qayangqirw−a，即马头金刚、马头明王，是马王的蒙、藏文称呼。经文中提到很多察哈尔地区的山川地名，所以推测该文献很有可能是清代察哈尔地区各马厂的一项仪式活动中使用的祷告文。由此可以判断哈杨奇鲁瓦，即马头明王的崇拜在察哈尔地区很受重视。[9] 哈杨奇鲁瓦庙作为清代皇家牧厂的祭祀场所，其地位很崇高。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额勒和布奏，档案号：03−4984−050。
② 《额勒和布日记》下，第 387 页。
③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745《理藩院》。
④ 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6《台站》，第 102−103 页。
⑤ 《理藩院则例》卷 32，第 386−387 页。
⑥ 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⑦ 董晓荣：《蒙文版〈察哈尔格西 · 罗桑楚臣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čaqar gebši yin namtar），乌兰巴托察哈尔察干乌拉庙藏刻本。
⑧ 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1《地舆》。
⑨ 《额勒和布日记》上，第 286、324 页。

除此之外，《口北三厅志》等汉文文献有比较早期察哈尔地区寺庙有关记录。① 据《口北三厅志》载，汇宗寺在“多伦诺尔北四十里库伦地方”，善因寺“在汇宗寺西南里许”。据雍正年间的一件档案载，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之徒众原在多伦诺尔之察罕布拉克、巴图布拉克等处游牧。② 会心寺“在汇宗寺西，善因寺之东，蒙古干珠尔巴诺木汗所建”。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内蒙各呼图克图”中罗列察哈尔部和锡林郭勒盟各旗呼图克图及其寺庙，察哈尔部内容没有提到干珠尔巴诺木汗，只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有名高僧称为“甘珠尔巴额尔德尼堪布喇嘛”，③ 这或许是在此图中提到的“干珠尔巴诺木汗”。另外，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所述“内蒙各呼图克图”及其寺庙，与地图上的寺庙能够对得上的只是正白旗柴尔图庙（差尔图庙）一座。其中，集福寺系右翼太仆寺“两群五旗人等共同建造之庙”。④ 民国《张北县志》交代了有些牧厂、台站所属的寺庙 ⑤。将其信息和《蒙藏佛教史》对比可知崇禧寺即海流图庙，其沙布隆喇嘛是清代官方认可的呼图克图之一。清代档案也记载不少察哈尔地区寺庙状况，如雍正十三年档案里就提到镶红旗的玛尼图庙。⑥ 这应该就是属于章嘉呼图克图的那座寺庙。此外，《前绥远垦区清理丈放地图》之镶红和镶蓝二旗的地图都注记各有一座玛尼图庙，与《察哈尔八旗地图》相同。大一点的寺庙都有自己的香火地，贻榖推行官垦后给这些寺庙依然遗留一定的土地，作为喇嘛们的养赡之地和寺庙香火地。⑦

左翼正白旗图的图例比较丰富，在该旗中心位置有“本期印房、满洲理刑官衙门、寿安寺”等机构，背靠额尔德尼察汗鄂卜图山，山上就有鄂博的标志，很醒目。镶红旗图注明“本旗鄂博”，说明该鄂博是镶红旗祭祀的中心鄂博。鄂博一般位于高地，作为当地的守护神和地神的神祠，享受特别的崇拜。⑧

第五，从地图可以了解到晚清察哈尔地区农耕进展、村落形成及其对蒙古经济生活的影响。

在整个沿长城的蒙古地区中，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地区和卓索图盟喀喇沁、土默特地区的农耕化比较早。察哈尔地区在康熙年间已经有农业的发展及村落的形成，雍正至光绪年间，陆续设置张家口、丰镇、宁远等厅县。⑨ 清末民国时期，察哈尔和河北、山西地区接壤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地带的形成，旗县的构成都是清代农耕者和游牧民交往的结果。察哈尔地区的农耕，首先是从官私牧厂土地的开垦开始的。举例来讲，据乾隆朝《大同府志》载：丰镇厅，“国朝初系蒙古察哈尔正黄、正红旗游牧地，其南毗连民地者为太仆寺牧厂。”⑩ 早期设置的厅已经有其专门管辖的地域，从原属各旗和牧厂中划分出去了。⑪ 清中期推行的政策是划分蒙汉，分别由旗、厅管理。但事与愿违，未能控制住开垦的发展，各旗、牧厂内的升科地继续归各厅兼管。

各旗地图中镶蓝、镶红二旗地图很形象地表现了农牧交错带之状态。镶红旗图多处画有蒙古包，表示蒙古人的居住及游牧经济地带。与此相对，镶蓝旗地图多处画有华北地区典型的民房图例，以表示村落及农耕地带。镶蓝旗的这些村落由南到北有：榆树林村、太平集村、察罕

---

① 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4《坛庙》。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雍正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档案号：0016-782-0001。

③ 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四章“内蒙各呼图克图”，第 214 页。

④ 贻榖：《蒙垦奏议》，光绪三十年九月，第 17 页。

⑤ 《张北县志》卷 3，成文出版社，1968 年。

⑥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查勘草场之都司刘文仁殴打蒙古人等情折》，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档案号：0061-788-0002。

⑦ 《贻谷批左翼局详请发给庙香火地亩实收札发该局庙地空白执照二十张填给该庙承领由》，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 1636-1637 页。

⑧ 图齐、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王尧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498-501 页。

⑨ 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 4《职官》；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第 223-225 页。

⑩ 乾隆《大同府志》卷 1《沿革》，国家图书馆藏。

⑪ 乾隆《大同府志》卷 3《疆域》，国家图书馆藏。

布拉克村、乌兰达填村、孤树村、察罕库伦村、七上窑子村等 7 个村庄。这并不是镶蓝旗全部村庄的地名。因为，据山西巡抚奏报，察哈尔右翼牧厂于乾隆三十一年准备招垦，“分设大小村庄八十余处”。① 当时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农耕村落了。1892 年底，俄国蒙古学家波兹德涅耶夫从外蒙古去往张家口的路上，看见察哈尔正黄、镶黄等旗内的汉人村庄。②

第六，可以了解到晚清八旗都统驻防城镇张家口的状况。

在前面提到过，在《察哈尔八旗地图》9 幅图内第二幅是有关张家口城镇的地图。③ 我们知道，张家口是在明代中晚期和蒙古的商贸关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乾隆二十六年之后，张家口是察哈尔都统衙门、万全县衙门和张家口理事同知衙门所在地。清代张家口处在汉蒙及旗人杂居地带，作为京师北面门户，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但是，历代地方志等文献对城镇内部的地理结构等信息记述得比较简略。因此，我们目前对张家口从晚明长城边堡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知之甚少。④《察哈尔八旗地图》在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地图反映了当时各官署之地理位置。晚清张家口的景象，波兹德涅耶夫游记记载较为详细、可靠。但是，他并不明白察哈尔都统还统辖察哈尔八旗、牧厂和台站等。据档案，张家口厅和万全县的关系是，“多厅向驻口外，张、独两厅则借驻口内之万全县、赤城县境。计该三厅所辖，向只就报垦升科之地附近何厅即归何厅治理”。⑤ 张家口厅借驻万全县境内，在这方面波氏理解也很准确。

波氏游记又言：“作为商业城市，张家口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堡，另一个是下堡。出了元宝山峡谷继续前行，首先来到上堡，从大境门进去马上可以看到一个三岔路口：较大的一条路通向大门街，这是这座城的主要街道；另一条较小的路往左拐，通向张家口的买卖城。”⑥ 买卖城就是地图上出现的“市圈”。⑦ 波氏就提到一个税务司即税务衙门。⑧ 此税务衙门在北门附近，所以应为地图所记的“边口税局”。

张家口驻防八旗满洲有八个佐领，左右两翼蒙古有两个佐领。⑨ 贻穀推行官垦时，给这些张家口的驻防官兵分拨察哈尔镶黄旗和正黄旗羊群为放荒地，作为随缺地。⑩ 另外，波氏游记的可贵之处是，详细地记述了当地八旗驻防旗营。⑪ “三座营房中，居住士兵的两座营房和上堡直接相连，一在城东，一在城西，第三营房在南面，里面有驻军的办事房、武库和粮仓等。在这座营房的大门口有一块相应的满额：dacun silingga kūwaran。”⑫ 满语 dacun silingga kūwaran，意为“健锐营”。地图记为“精锐营”，与波氏游记的汉译不同。

满洲驻军的校场把张家口分隔为上下两部分，即上堡和下堡。“在东西营房之间有一片大广

---

① 《宫中档朱批奏折》,《奏为勘明察哈尔右翼牧厂招垦地亩分别筹办事》，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山西巡抚彰宝奏，档案号：04-01-23-0059-044。

② 阿 · 马 ·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2 卷，张梦玲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80-181 页。

③ 早期研究有：今村鸿明：《张家口研究》,《内陆亚洲》第 2 辑，生活社刊，1942 年。

④ 黄丽生：《从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社会经济变迁（14 世纪中至 20 世纪初）》，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5 年。

⑤ 《宫中档朱批奏折》,《奏为察哈尔左翼垦地日广拟请将张家口、独石口两厅移驻口外并添设厅治事》，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察哈尔都统奎顺奏，档案号：04-01-01-1059-054。

⑥ 阿 · 马 ·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张梦玲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03 页。

⑦ 阿 · 马 ·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第 703 页。

⑧ 阿 · 马 ·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第 705 页。

⑨ 《宫中档朱批奏折》,《察哈尔都统奏为遵照部示循例奏闻张家口满蒙十旗佐领应用图记造具印模字样事》，道光三年四月初十日察哈尔都统富兰奏，档案号：04-01-02-0125-014。

⑩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 1734 页。

⑪ 阿 · 马 ·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第 710 页。

⑫ 阿 · 马 ·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第 711 页。

场，北首是衙门和都统府，中间是一座‘万寿宫’帝庙，官兵在此庙中为皇帝祈求长寿。”[①]“下堡的庙宇不下四十座，现在最美观的一座是武城街北头的河神庙。这座庙是十五年前满洲驻防军为崇祀张家口河的河神而捐资兴建的。”[②]万寿宫、河神庙均被记在《察哈尔八旗地图》上。

此外，清代察哈尔的山川等自然地理信息在官修的《皇舆全览图》《一统志》《大清会典》等系列都有所反映，只是相关人文地理方面的信息严重缺失。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了地图所反映的人文地理信息。

四、余论

以上根据《察哈尔八旗地图》及相关档案文献，探讨了该地图绘制年代、反映的信息和文献史料价值等问题，基本认定该图的绘制时间为光绪二年十月至四年四月之间。我们现在综合各种文献信息后，有条件考虑清廷对长城地带，尤其是面对蒙古的长城以北口外地区治理方面的战略考量及其作用问题。

清前期，张家口、独石口外形成的政治地理格局是长城以北沿线地带基本上由内务府所属庆丰司、上驷院及八旗、兵部、礼部、太仆寺等牧厂占据。而察哈尔八旗处于各官方牧厂以北、锡林郭勒盟所属各扎萨克旗以南地带。当然，相对较晚的赏赐给功臣和宗室王公的牧厂穿插在察哈尔各旗或各官方牧厂之间。其中，察哈尔八旗的各牛录又在原察哈尔部人的基础上，陆续掺入巴尔虎、喀喇沁、额鲁特等蒙古各部人户。察哈尔沿长城地带成为多部族、多族群共居的农牧交错地带。[③]

平定准部之前，清廷对察哈尔地区的治理，一方面是严格控制长城各关口，以保障京城的安全，另一方面，以安排各种牧厂和掺入其他蒙古部落人众等方式，从内外两个方面逐步控制这一往日蒙古最后大汗之本部。其中，尤其注意对属于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旗人和八旗上三旗的察哈尔镶黄、正黄和正白的扩充和严格控制。因此，入关后清廷不仅在北京周围五百里内进行圈地[④]，还注意控制长城地带，随后为北京到热河（承德）的统治“核心区”[⑤]的构建投入了几代皇帝的精力。其间，康熙朝设置面对蒙古的五口驿站体系。其后，又因和准噶尔部的对峙再设阿尔泰军台。另外，清廷在各旗、牧厂和厅之间的边界地区又设置内部卡伦。清朝统治的“核心区”与驻防之间通过驿传交通形成权力网络，有效地进行着国家层面的治理。

当然，清廷的这些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量在清前期是针对准噶尔部。历次对准部的军事行动中都派遣察哈尔八旗及各牧厂的牧丁等，察哈尔地区的官私牧厂一方面供应北京内廷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给准噶尔前线提供所需马匹、骆驼、所食牛羊等军用物资。乾隆朝平定准部后，从察哈尔八旗派遣十几个佐领人户，填充因准部失败而在新疆出现的驻防上的空虚。我们从清廷对地理空间的掌控可以窥见其国家安全上的制度性安排。长城地带在清廷地缘政治的战略上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先学者们一般把游牧八旗和内外扎萨克蒙古都

---

①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711页。

②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717页。

③ 哈斯巴根：《清代蒙古八旗口外游牧地考》，《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哈斯巴根：《清代口外王公牧厂探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④ 相关研究有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定宜庄，邱源媛：《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⑤ 清朝统治“核心区”问题，拟专文探讨。相关研究可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2分（1986年）；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置于一个“边疆民族”的平台上去讨论，而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学界应对此种界定方式有更全面的认知才是。

References

Ding Yizhuang and Qiu Yuanyuan. *Jinji Wubai li: Qingdai jifu diqu de qidi yu zhuangtou* (Five hundred li around the capital: the bannermen's land and land masters around the capital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6.

Jin Feng. "Qingdai Neimenggu wulu yizhan" (Post stations of the five roads in Inner Mongolia of Qing Dynasty). *Neimenggu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1(1979).

Hasbagana. "Menggu baqi kouwai youmudi kao" (A study of the nomadic habitations outside the Great Wall of the Eight ba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3(2021).

Liu Wenpeng. *Qingdai yichuan jiqi yu jiangyu xingcheng guanxi zhi yanjiu*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tage and territory form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04.

Mao Hanguang. "Beiwei dongwei beiqi zhi hexin jituan yu hexinqu" (The core group and core area of Northern Wei, Eastern Wei and Northen Qi).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Collected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Language Research)57. 2(1986).

Qi Meiqin. *Qingdai baoyi qiren yanjiu* (A study on the booi bannermen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19.

Tan Qixiang, ed. *Zhongguo lishi dituji* (The completion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Beijing: Ditu chubanshe, 1982.

Wang Dequan. "Hexin jituan yu hexinqu lilun de jiantao" (A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Core Group and Core Area). *Zhengzhi daxue lishi xuebao* (Journal of History of Chengchi University)25(2006).

Zhou Qingshu, ed. *Neimenggu lishi dili*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nner Mongolia).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94.

Zhou Zhenhe. *Zhongguo xingzheng quhua tongshi, qingdai juan*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divistions, Qing Dynasty volume).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akhar Eight Banners' Map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sbaga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sbgn@126.com)

Abstract: The Chakhar Eight Banners' Map with nine drawings folded in one envelope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reflect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Chakhar reg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Mainly based on archives of Vermillion Endorsed Memorial and Grand Council archives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at the atlas was drawn between the tenth month of second year of the Guangxu reign(1876) and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fourth year of the Guangxu reign(1878). The author evaluat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atlas from the annotations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Niulu boundary, imperial and private pastures, Kalun station, Obo temple, farming villages, and Zhangjiakou. After synthesizing various literary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Qing court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Great Wall area, especially in areas outside the passes.

Keyword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hakhar Eight Banners' Map of the Guangxu period